

英文版总主编

WILLIAM DAMON RICHARD M. LERNER

中文版总主持

林崇德 李其维 董 奇

儿童心理学手册

(第六版)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IXTH EDITION)

第一卷(下)

人类发展的理论模型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英文版本卷主编

RICHARD M. LERNER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文版总主编 WILLIAM DAMON RICHARD M. LERNER

中文版总主持 林崇德 李其维 董 奇

第一卷（下）人类发展的理论模型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英文版本卷主编

RICHARD M. LERNER

儿童心理学手册

（第六版）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IXTH EDI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心理学手册:第6版.第1卷,人类发展的理论模型/(美)戴蒙,(美)勒纳主编;林崇德等译.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675-3002-7

I. ①儿… II. ①戴…②勒…③林… III. ①儿童心理学—手册 IV. ①B844.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8851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 第一卷 人类发展的理论模型

英文版总主编 WILLIAM DAMON RICHARD M. LERNER

英文版本卷主编 RICHARD M. LERNER

中文版总主持 林崇德 李其维 董 奇

责任编辑 彭呈军

文字编辑 刘荣飞 李艳璐 王 晴 刘 涛

责任校对 乔惠文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苏州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75.5

字 数 192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二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002-7/B·907

定 价 180.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 第一卷 （下）

第一卷 目录

《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中文版序/1

《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前言/9

致谢/19

- 第 1 章 发展科学、发展系统和当代的人类发展理论/1
RICHARD M. LERNER
- 第 2 章 发展心理学：哲学、概念和方法论/20
WILLIS F. OVERTON
- 第 3 章 发展心理学的历史/102
ROBERT B. CAIRNS 和 BEVERLEY D. CAIRNS
- 第 4 章 发生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196
JAAN VALSINER
- 第 5 章 生物学对人类发展的意义：发展的心理生物学系统观/247
GILBERT GOTTLIEB, DOUGLAS WAHLSTEN 和 ROBERT LICKLITER
- 第 6 章 动力系统理论/300
ESTHER THELEN 和 LINDA B. SMITH
- 第 7 章 动作和思维的动态发展/363
KURT W. FISCHER 和 THOMAS R. BIDELE
- 第 8 章 情境中的人：整体—交互作用方法/469
DAVID MAGNUSSON 和 HAKAN STATIN
- 第 9 章 发展中的个体：经验的视角/541
KEVIN RATHUNDE 和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 第 10 章 人类发展的行动观点/601
JOCHEN BRANDTSTÄDTER

第 11 章	发展心理学中的毕生发展理论/659 PAUL B. BALTES, ULMAN LINDENBERGER 和 URSULA M. STAUDINGER
第 12 章	生命历程和人类发展/762 GLEN H. ELDER Jr. 和 MICHAEL J. SHANAHAN
第 13 章	发展的文化心理学——一个心理,多种心性/818 RICHARD A. SHWEDER, JACQUELINE J. GOODNOW, GIYOO HATANO, ROBERT A. LeVINE, HAZEL R. MARKUS 和 PEGGY J. MILLER
第 14 章	人类发展的生物生态学模型/907 URIE BRONFENBRENNER 和 PAMELA A. MORRIS
第 15 章	现象学生态系统理论:多元群体的发展/951 MARGARET BEALE SPENCER
第 16 章	积极的青年发展:理论、研究与应用/1028 PETER L. BENSON, PETER C. SCALES, STEPHEN F. HAMILTON 和 ARTURO SESMA Jr.
第 17 章	宗教信仰与精神信仰的毕生发展/1084 FRITZ K. OSER, W. GEORGE SCARLETT 和 ANTON BUCHER
	主题索引/1154

第 10 章

人类发展的行动观点*

JOCHEN BRANDTSTÄDTER

行动观点在发展心理学中的兴起/601

文化对发展的调节/603

个人对发展过程的调节/605

历史摘记/606

行动的概念/608

行动的结构理论/608

行动的动机理论/608

行动的控制—系统理论/608

行动的社会—建构主义概念：活动理论/608

阐述行动：概念性成分/609

行动的制约条件：构成性和调节性规则/611

行动的多价性/612

行动的背景/613

发展的多样性和规律性：行动—理论的重构/614

发展一致性的建构与解构/615

发展的可塑性：弱和强的制约条件/617

发展中的不变性和普遍性：行动的理论视角/618

意向性自我发展和个人对发展的控制/624

意向性自我发展活动：结构和过程/624

意向性自我发展中的自我观察和自我监控/625

自我评价过程/628

从目标到行动：发展目标的界定和执行/630

个人对发展的控制：发生和发展性变化/635

意向性行动：发展的视角/635

与控制相关的信念和动机的发展/637

意向性自我发展和发展中的自我/639

保持个人连续性和认同性：同化和顺应过程/642

总结和结论/647

参考文献/648

行动观点在发展心理学中的兴起

发展心理学从多种理论角度阐述了人类发展的条件和限制。但是，尽管行动观点

* 我要感谢 Richard M. Lerner, 他对整个手稿提出了精心的编辑意见, 还要感谢 Werner Greve, 他对之前的一份草稿给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action perspective)在发展研究和理论解释中日益得到重视,但对于个体在生命全程中对他/她自身发展史创造的贡献,却尚未获得足够关注。通过行动以及体验我们行动的结果,我们建构起对自身以及所处的物质、社会和符号环境的表征,并且这些表征会引导和激发那些塑造和影响我们行为和个人发展的活动。

517

如此,行动形成了发展,而发展又形成了行动:个体既是积极的产生者,也是他/她自身发展的产物。因此,行动理论观点的核心理念是,如果不关注自我反思(self-reflective)和自我调节(self-regulative)的环路,即将发展变化与个体通过行动和思考解析他们个人发展的方式联结起来的环路,那么就不能充分理解人类的发展,包括成人期及生命后期。这并不表明,个体是他们自身生命史的唯一或者无上产生者。正如任何其他类型的活动,个人发展的相关活动受到文化、社会历史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在部分程度上或者甚至完全在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外,但是却决定性地构成了行为和发展可能选择的范围。因此,发展的行动理论观点不仅要考虑那些个体用来尽力控制生命过程中其自身发展的活动,而且还要考虑引导这些活动的非个人或个人外影响因素。

关于人类个体在塑造他们自身发展和成熟中存在积极作用的观点从未受到正面质疑。但是,至少直到最近,尚无将此观点组织成详尽理论阐述的系统工作。虽然行动已经被认为是每一个体生命史的构成要素,但是它们在发展理论中几乎没有扮演过要素角色(Dannefer, 1989)。推测而言,忽视此点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发展研究在从儿童早期到青春早期的形成性阶段上的传统优势。自我调节活动和意向性自我发展(intentional self-development)与个人目标、规划和认同计划(identity project)有关;这些定向成分通常在向成人期的过渡中,在独立性和自主性发展任务的重要性增加时,变得更加分化和具体。行动理论观点的早期拥护者同时也支持发展的生命全程观点,这当然不仅仅是巧合;Charlotte Bühler(1933)是一个突出例子。对行动理论观点的忽视也可能反映了更深的在认识论和方法学上的保守性。将因果解释模式应用于行动是科学哲学上长期存在且仍存在激烈争议的一个争论焦点,而且最后结论尚不得见(如,Brand, 1984; Lenk, 1978; Thalberg, 1977)。此外,行动观点将发展视为由集体和个人行动共同塑造和引导的一个过程,这看起来与寻找发展的决定性规律和普遍性原则是几乎不一致的。这些问题稍后会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但是在此处应该指出,那些关于人类发展的普遍性、有序变化和决定论的观点近年来已经受到了多方面抨击(如,Bruner, 1990a; Gergen, 1980)。与此同时,对行动理论观点的关注却在过去几十年中日益增加(如,Brandtstädter, 1984a, 1984b, 2001; Brandtstädter & Lerner, 1999; Bruner, 1990b; Chapman, 1984; Crockett, 2002; Dannefer, 1984; Eckensberger & Meacham, 1984; J. Heckhausen, 1999; J. Heckhausen & Dweck, 1998; Lerner, 2002; Lerne & Busch-Rossnagel, 1981; Silbereisen, Eyferth, & Rudinger, 1987; Valsiner, 1989)。

行动观点似乎为发展和文化观点的整合提供了一个有利结合点。实际上,发展、文化和行动的概念是内在联系的,如图 10.1 所示。作为个人和集体活动的结果,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产物——这是本章中提出的核心论点。相反,行动和自我调节活动取决于发展性变

化;激发和指导这些活动的目标、价值观和信念在个体发生(ontogenetic)和文化—历史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发生变化。类似的概念性和功能性联系也联结了行动和文化领域。尽管文化变革和变化的长期和连续动态性往往在任何单一个体控制之外,文化仍然是个体行动和决定的集体结果(Hayek, 1979)。另一方面,文化构建了塑造行动可能性、结果和意义的行动空间(Boesch, 1980, 1991),并且文化习俗还构成了特定类型的行动,正如我后面所要解释的。上述关系也表明了文化和人类个体发生之间的功能依赖性,这种关系以建构性和选择性行动为中介:个体塑造他们自身的发展生态环境,以此调节他们自身的发展;他们建构了某种个人文化(Heidmets, 1985),这成了更大的文化宏观系统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文化情境又形成了引导和规范发展通路的局限性和“可能性”(affordance)——使用 Gibson(1977)的术语——的某种排列。这种引导作用是文化系统维持和自我保存的一种基本要求;反而言之,人类个体发生从物质、社会和心理等方面而言,最根本上依赖于文化情境的调节和保护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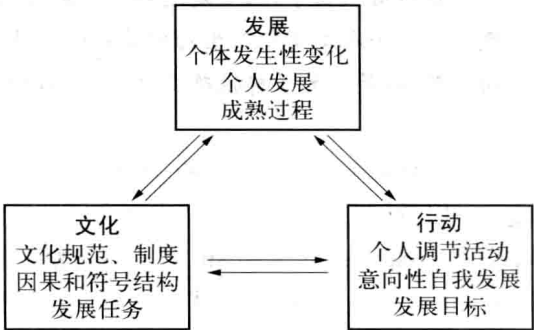


图 10.1 发展、文化和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518

在以下部分,我将重点关注在文化和历史情境下,个人和集体行动如何以多种方式构成毕生发展,又是如何以多种方式在毕生发展中被塑造。

文化对发展的调节

对个体发生和随年龄阶段所发生变化的调节和控制是文化稳定、复制和自我更新的过程所必需的(如,Bourdieu & Passeron, 1977)。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受其支配的一整套广泛的技术、制度或者规则来调节发展,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代理(proxy)和支架(scaffold),人类实际上不可能发展。新生儿和幼儿完全依赖于某个人,这个人照顾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发展,并且以促进成长和防御伤害性影响的方式组织环境事件。在教育和社会化过程中,即确定贯穿生命周期的发展任务、可能性和选择等因素的某种排列,发展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变得日益突出。和发展本身一样,对发展的引导和控制也是一个毕生的过程。此过程服务于传递文化价值观和问题解决方式以及反复灌输一些态度、品质和技能,这些态度、品质和技能是在某种文化—历史背景下生存和共存所必需的,或者被认为是必需的。然而不管如何,文化的个体发生要素更深地植根于现代人类种族的生理构造和种系发生进化中(如,Tobach, 1981)。

发展的强可塑性和开放性是使个体发生的文化背景化成为可能并增强的进化性和生物性范畴之一。只要文化概念暗含着养成和完善某些易修正目标或过程(尤其是生命本身)的意义,这些特征就已经隐含在文化的概念中了。早在 1977 年,Johann Nicolas Tetens 就认为人类发展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建立在两个基本条件的前提之上:具有反思和自我

参照行动(*innere Selbsttätigkeit*^①)的能力以及发展的可修正性。

在所有生物中,人类是迄今为止最可能渐臻完美的物种,从出生起就具有最大的发展潜力……人类是所有生物中最具适应性、能力最多样的,能够按照预定的广泛领域内的活动,以最大的多样性改变自己。(Tetens, 1777, p. 40; trans. J. B.)

关于文化和个体发生之间的功能联系在下列论断中被表述得更加淋漓尽致,即:文化制度——以及创造文化所必需的发展和行动潜力——是对人类生物体中缺乏特定的适应自动化作用(*adaptive automatism*)的一种补偿。这一观点可以追溯至 Herder(1772)的著作;它在 Gehlen(1955/1988)的人类学体系中被采用并获得详尽阐述。正如 Gehlen 所直接指出的,人类个体是一种“有缺陷的生物”(deficient being),其特点是缺乏自然特化器官以及与特定环境的固定联系,因此对他们而言,文化就变成了其“第二天性”:

人类是一种行动中的生物。从狭义而言,他也是“不确定的”——他对自身提出挑战。行动就是人类发展对外部世界态度的需要的表达。就他给自身提出问题而言,他也必须发展起对自身的一种态度并利用自己……对于某种“不确定”生物的生存而言,旨在达到某种确定生存状态并加以维持的自制、训练和自我改正(*self-correction*)都是必须的。(Gehlen, 1955/1988, pp. 24—25)

根据这个角度,文化通过提供某种“躯壳之外”的人为安排来保障生存和发展,即适应性的补偿方式(参见 Geertz, 1973)。但是,关于人类是“有缺陷生物”的观点可能具有误导性,以至于将缺乏自然特化器官等同于适应性缺陷。实际上,人类通过创造性和建设性行动应对逆境的非凡能力,已经更多于对缺乏适应自动化作用和本能调节作用的补偿。为了灵活应对由不稳定环境引起的持续不断和变动的适应性挑战,行为的组织必须具有适于变化以及经验式修正的充足空间。中枢神经系统的皮质和新皮质区域的超常生长为行为的认知和动机控制提供了必要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此处尤其要提到的是抽象、归类和表征能力,这促进了个体从不断涌现的事件中抽取规则和规律以及有可能对行动和效果进行心理模拟。人类的适应能力由于语言和沟通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语言能够传递知识,既为行为的社会控制又为自我控制和自我强化提供了符号手段(如, Luria, 1979; Zivin, 1979)。明显延长的心理成熟和成长阶段,与此相应的长时间的保护和照顾阶段,以及家庭和群体结构的出现,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支持进化性因素的复合体,它们同时决定了人类发展的脆弱性以及潜力(参见, Bruner, 1972; Gould, 1977; Lerner, 1984)。

这样,文化和发展就形成了一个功能性综合体,只有在考虑到行动及自我相关活动的中介作用时,才能对其进行充分评价。文化是在文化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问题解决形式的聚

① *inner Selbsttätigkeit*: 德语。——译者注

合体系;他们为来源于人类物种生物构造的适应性问题和文化体系自身的维持及进一步发展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并且他们也提供了指引人类行动者在寻找意义和目标中现存的方向。最重要的是,文化通过补偿性策略和“修补装置”(prosthetic device)(Bruner, 1990b)来增大行动资源和发展选择性,因而使发展主体超越身体构造的局限性。这些补偿装置也包含“心理工具”(psychological tools)^①(Vygotsky, 1960/1979),它们体现在文化习俗、制度和知识体系中:

心理工具是人为结果。从本质而言,他们是社会性质的,而不是机体性质或者个体性质的。他们直接指向掌握或者控制行为过程……由于被包含在行为过程中,心理工具改变了心理功能的整个流程和结构……正如机械工具改变了自然适应的过程一样。(Vygotsky, 1960/1979, p. 137)

将发展界定为遗传和环境影响因素两者交互性产物的陈词滥调对调节发展、行动和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漠不关心。环境是“由机体组成的自然”(Lewontin, 1982, p. 160);同样地,发展的生态系统是限制和激活意向性自我发展的“意向性世界”(Shweder, 1990)。

我们不能将体现行动和文化性行动空间本质特征的语义和符号内容还原为物理或者生理过程。虽然行动的意义可能与行动的物理特征相关并在部分程度上从中引出,但是行动的意向性和物理性方面之间的关系不能考虑用还原解释的方式进行关联(Dennett, 1987)。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观点必定要抛弃行动的“自然”基础和局限性。自然和文化方面在发展过程中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Boesch, 1980; Brandtstädter, 1984a, 1984b; Dannefer & Perlmutter, 1990; Gibson, 1977),并且我已经指出过发展的文化和种系发生基础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发展遗传学中,对发展的遗传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行为系统为中介的这一事实日益有了认识(如, Gottlieb, 1992)。个体选择和创造他们的环境所依据的偏好和能力,即表型特征,是与基因型因素相联系的;这些特性也影响着个体对他们选择接触的环境影响所作出的反应方式(如“基因型—环境的积极共变”的概念; Scarr & McCartney, 1983; 又见 Plomin, 1986)。通过他们的行动,个体形成并不断改变他们的表现型,并将之延伸到其个人文化和发展史中。

个人对发展过程的调节

人类发生的文化调节与意向性自我发展过程紧密交织,并在部分上以后者为中介。积极的主体是文化系统的构成性和生产性元素,该系统通过个人行动不断被实现、维持和更新。与此同时,个体的行动在物理和符号方面都被牢牢地限制在文化的行动空间内;正是通过通过与文化情境的互动,个体才能分析可能的和所期待的发展过程的前景,并获得实现这些

520

① 心理工具是维果斯基认知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指人为创造的标记、符号、文字、公式、图像等。它们能够帮助个人去掌握适应于自己所在文化的心理功能,如感知觉、记忆、注意等。——译者注

前景的知识和方法。

因此,文化并不是一个从本质上就与自我发展相对立的力量体系,如同从卢梭开始的异化观点著作所主张的那样;相反,文化背景对自我调节过程既有限制又赋予可能。文化的要求及提供的可能性也许或多或少地与个体发展目标和潜力互相一致或者冲突。发展的个人和背景局限性之间的关系模式在文化演变和个体发生过程中不断被再定义和改变。这些变化,既包括在历史上也包括在个人一经历时间中发生的,在发展着的个体和文化生态体系之间的作用中永远会引发矛盾和差异:发展任务、角色期望或者表现标准可能会使个体的发展资源负担过重;社会机会结构可能阻碍个人目标和认同计划的实现,等等。正如辩证法所强调的(如,Kesselring, 1981; Riegel, 1976),这些差异和冲突在文化演变以及个体的毕生发展中都是驱动力,因为它们促进了其所起源的体系内的重新调整和全新整合。

个体能以多种方式对这些适应性问题作出反应。他们能根据情境限制和资源调整个人目标和规划,或者反过来,尝试改变外部环境以适合个人兴趣和能力;他们可能尽力回避或者抵制标准要求,或者适应它们。这些适应性活动通常旨在减少实际或者感知到的个人发展过程与个人对自我以及未来发展标准设想之间的差异;他们也服务于稳定和保持个人认同,从而展示生命体系所赖以维系和延续他们自身的自生成过程的功能特征(如,Brandtstädter & Greve, 1994; 对自生成概念的说明,见 Maturana & Varela, 1980; Zelény, 1981)。

上述思考结果支持和揭示了有关意向性自我发展过程为个体毕生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但是应该意识到,这些过程和任何人类活动一样,包含了在个人控制之外的要素。我们在构造和制约个人行动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矩阵中组织我们的生活和活动,我们改变这些背景制约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我们甚至对我们行动的“内部”背景影响也有限,尤其是我们不能随意改变我们自身的动机和信念(如,Brandtstädter, 2000; Gilbert, 1993)。此处,行动—理论观点到了必须进行仔细考察的地步。最后,任何人都不应低估偶然性、不可控事件和“偶然遭遇”(chance encounters)(Bandura, 1982a)在任何个体生活史中的影响,即使这里也可能涉及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因为个体可能自主选择或主动寻找机会。

从行动主体的角度来看,生命的毕生发展似乎是期待和不期待、可控和不可控要素的混合,或者说是一个得和失、成和败的故事(Baltes, 1987; Brandtstädter, 1984a)。努力保持这种有利的平衡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面。但是个体关于他们能够多大程度改变个人发展过程的感觉是不同的,而且这些差异会显著影响对自我和个人未来的情感态度;感觉自己无法达到期望的发展目标或者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与生活中的抑郁和丧失意义感相联系。

历史摘记

人类发展的行为观点具有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久远历史。在 Aristotle 的哲学著作中就已经清楚表达了人类创造自身的观点,将行动视为人类根据理性设想以此改变自我和生活的过程(Müller, 1982)。在文艺复兴时期,自我形成和自我完善观点盛行,甚至成为生活的

主导形式。关于通才的文艺复兴时期理想(Renaissance ideal of *uomo universale*),指那些在所有发展领域尽力追求自我完善的个体,在 Shaftesbury、Herder、Schiller 和 Goethe 的著作中得到了传播(Spranger, 1914);之前提到的 Tetens 关于人类发展“可完善性”的观点明显仍受到此理想的影响。Giambattista Vico (1725/ 1948)甚至将他的历史文化哲学建立在以下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能真正理解的只有我们自己所创造的那些事物(参见 Bunge, 1979)。

在早期德国心理学中——尤其是哲学导向的“内省”(understanding)心理学分支(Dilthey, 1924; Spranger, 1914)——人类发展一直被视为是一个积极自我发展的毕生过程(Höhn, 1958)。在 Charlotte Bühler 关于生命过程中发展的概念中(Bühler, 1933; Bühler & Marschak, 1969),其理论焦点在于个体具体化和实现人生目标中的成功和失败,而其要点却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就已产生。但是,意向性自我发展的早期概念却强烈地充满了自由和自发的含义,并且通常包含反因果关系论者的方法学观点。这些见解并没有在某个能够日益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学理念证实自己的学科领域找到肥沃土壤(如, Cairns, 1983; Reinert, 1976)。

特别是,明确反心灵主义者观点的行为主义的兴起,阻碍了行动观点被更为广泛地接受和进一步发展。尽管正是行为主义者的方案,宣扬了发展过程几乎无限的可操作性和可改变性,上述仍然属实(Bijou & Baer, 1961; B. F. Skinner, 1953; J. B. Watson, 1930)。也正是在行为主义者的理论框架中,首次系统提出了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主题。在行为主义者看来,自我调节可简化为个体通过操作刺激和强化偶然事件借以控制他们自己行为的过程:“当某个人控制自身时……他便在行为。他通过操作一些变量(这些变量是行为的功能),精确地控制自己正如他控制其他任何人的行为一样。”(B. F. Skinner, 1953, p. 228)但是,一种抵制心灵主义术语(如个人目标、信念或者意向等解释性概念)的理论观点,是很难把握对行动观点具核心意义的那些特殊主题的;即,将个人发展与构成文化背景的意义系统、制度和标准以及文化背景内的个人活动联系起来。

在心理学领域内,对于这些问题的兴趣在 19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的所谓认知革新中又重新开始。对行为主义方法学的哲学和认识论批判(如,Putnam, 1975)为驱散围绕着行动概念的疑云作出了进一步贡献。如今,行动理论方法在许多研究领域都占据显著地位。而且,关于解释和理解,自由和决定论,或者因果关系论和意向论之间的传统二分法也已经丧失了很多的敌对性色彩;呼吁让这些观点兼容并蓄,或者至少和谐共存的哲学立场已被提倡(如,Davidson, 1980; Dennett, 1987)。心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复苏,以及对行为和发展的文化基础的理论关注的增强——Bruner 甚至预言了“背景革新”的即将来临——都在行动理论取向中找到了自然契合点:

一种文化心理学,几乎由其定义决定,将不会专注于“行为”而是其基于意向的相应对象——“行动”,更为明确一些,是情境行动——处于一定文化背景之中,参与者之间存在多元互动状态下的行动。(Bruner, 1990a, p. 15)

行动的概念

遗憾的是,或者不是,尝试要阐明行动概念不能从其参照的单一或者唯一理论框架出发。行动理论的观点表述在一些非常不同的领域得到了促进,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哲学以及经济学;而即使在这些学科中,行动的概念也以不同形式出现。

在更窄的心理学领域,我们可以大致区分出行动的结构理论、动机理论、控制—系统理论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行动的结构理论

这一系统的理论集中于对行动的结构分析。结构分析有不同形式,而且不是总有可能把它们清楚地分开。其中一个方向的研究特别集中于行动的形态结构以及行动所基于的认知操作;这种取向以 Piaget 的工作为代表(如,1970, 1976)。其他取向则更多集中于特定活动和技能的成分分析(如, Fischer, 1980; Mascolo, Fischer, & Neimeyer, 1999)。然而,这种结构取向的另一个派生理论则在对组成不同类型行动的基本构成特点,比如他们的行动者、工具、目标、对象以及进一步的背景要素的分析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如, Aebli, 1980; Bruner, 1982; Fillmore, 1968; Schank & Abelson, 1977)。

行动的动机理论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行动理论表述是在动机心理学中得到发展的,可能最突出的是源于 Tolman 和 Lewin 两者的期望—价值行动模型(expectancy-value models of action)(综述见 Feather, 1982; Krampen, 1987a)。根据这个理论的基本解释模式,行动由以下两方面的联合作用进行解释并预测:(a) 与行动—结果一致性相关的个人期望和(b) 根据个人目标和标准对期望结果的主观评价。在这一基本模型上已经提出了不同的派生和扩展模型(如, Ajzen, 1988; Atkinson, 1970; Fishbein & Ajzen, 1975; H. Heckhausen, 1989; Vroom, 1964)。

行动的控制—系统理论

在 G. A. Miller, Galanter 和 Pribram(1960)的传统理论中,此类行动理论取向采用了控制学和系统论的概念。基本的分析工具是反馈循环圈:将目标转换为行为,以及调节目标有关活动的相关过程,被描述为是具有多层组织水平、差异逐渐缩小的反馈环路(如, Carver & Scheier, 1981, 1998; Ford, 1987; Powers, 1973)。

行动的社会—建构主义概念:活动理论

行动研究的主要原生分支是从前苏联的 Vygotsky 及其学生的工作中产生的(Leont'ev, 1978; Luria, 1979; Vygotsky, 1934/1986)。这一取向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则,具有浓厚的社会历史色彩。目标指向的活动被视为外部现实和个体意识之间的中介因素;认知发展源于个人与文化符号以及物质对象和工具的交互作用,而工具作为客体化的思维和问题解决方式,组织着思维和行动(另见 Cole,1978; van der Veer & Valsiner, 1991; Wertsch, 1981)。

这样的分类方式不能说是穷尽的;在理论集合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且有更广范围内的研究方案在不同程度上借用或者整合了来源于前面所述的理论体系的要素。例如,这些方案关注行动的社会认知方面(如,Bandura, 1986, 1997),文化符号角度(如,Boesch, 1980, 1991; Bruner, 1990a, 1990b; Valsiner, 1998),或与行动和行动计划的形成及实施相关的过程(如,Frese & Sabini, 1985; Gollwitzer & Bargh, 1996; Kuhl & Beckmann, 1985; von Cranach, 1982)。在相邻学科内也作出了对行动理论颇具影响力的贡献,尤其是社会学(如,Bourdieu, 1977; Parsons & Shils, 1962; Schütz, 1962)和人类学(如,Geertz, 1973; Gehlen, 1955/1988; Tyler, 1969)。最后,行动的分析性哲学体系为阐述行动的概念作出了显著贡献(综述参见,Brand, 1984; Care & Landesman, 1968; Moya, 1990)。之前提到的一些理论观点从一开始就是在发展的框架中形成的,或者被界定为发展理论;这对结构主义者和社会—建构主义者取向尤其是这样。这些理论取向为更综合的意向性自我发展理论观点贡献了重要元素,这将在后面章节中进行概述。

这些介绍性评论应该已经清楚表明,集中于行动概念的不同理论和研究方案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体系。鉴于行动概念内在的多学科特性,要见到一个全面统一的行动理论似乎是空想。这就使任何想要形成统一定义的努力都是白费。为了阐明行动的概念,在以下部分,我将集中于一些一般性的和相对没有争议的要素,这些要素似乎与概念化行动和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有关。

阐述行动:概念性成分

是否有可能鉴别出所有行动实例中都普遍具备,而且能将行动和其他不属于行动的行为模式分开的一系列本质性和区别性特征呢?当我们说到举动(act)、行动(action)或者类似于行动的活动(activity)时,显然不是不加区分地指向任一行为,而是那些能够并且应该以某种特定方式被解释和预测的行为。我们似乎在表明,被观察到的行为是个体由于其个人信念和价值观所选择的,因此能够被解释为是服务于某些个人目标或者表达个人态度和价值观。相应地,在解释行动时,我们会尽力去展示它们是如何与行动者的价值观、信念、态度或者能力相联系的。当我们把某个观察到的行为解释为行动或某种特定类型的举动时,我们就假定了行动者“可能可以采取不同方式做”(Chisholm, 1966),并且他/她有足够的自由避免这种行为的发生(甚至无行为有时候也能被认为是一种行动)。相反地,超出个人掌控范围的行为事件似乎就不符合行动的要求;生理反射、情绪反应和所有形式的下意识或出错行为(走神、记忆衰退等)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区分对于道德和伦理评价也是很基本的;根据道德规范内在的概念规则,公正、理性或责任感的标准只适用于意向性或个人控制的行为,而不包括非意向性行为事件(Austin, 1956)。

523

行为和行动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某个特定行为，作为一件可观察到的物理事件，常常只是组成一个行动的若干部分之一(Thalberg, 1977)。比如，问候的行动就可以具体呈现为多种在物理上不同的行为(如通过挥手、点头、说出某个口头的惯用语)；反过来，某个特定的行为，例如挥手，根据“内部”背景(个体的意愿、信仰等)、情境特定性以及符号体系、社会规范和惯例(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行为表示某特定行动)等，可以表达如下不同的行动，如问候、给信号或赶蚊子。因而，若要把某特定行为归类为某种特定类型的行动通常需要一个超越了直接观察到事物的解释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行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解释性建构(Lenk, 1981)。有时还要区分行动和举动，此处的术语举动是用于表示包含某特定行动的某些行动的一般类别或者类型(如, Harré & Secord, 1972)。同样地，同一类别的举动可以通过不同的行动来具体呈现，而同一行动又可以表示不同的举动。为了被认定是某些举动或者某些类型行动的具体表现，不同的行动必须互相具有一些结构上的相似性：它们必须拥有那些根据惯例和概念规则被认为是构成某单独举动类型的那些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点对于发展连续性(continuity)和一致性(coherence)的构建至关重要，这通常包括在不同个体发生水平上在表现不同行为之间建立结构性或者“同型”的等价物(Kagan, 1971)。

因而在第一个步骤中，我们在定义行动时可能要考虑诸如意向性、个人控制、自发性和(感知到的)选择自由度之类的标准(如, Groeben, 1986; T. Mischel, 1969)。然而，这些标准没有一个是存在问题的。就意向性标准而言，有意行动的结果往往包含不期望的或有害的只是被容忍的副作用；当人们并非集中关注这些副作用时，他们可能也要对这些附属效应承担道德和法律上的责任。另外还存在意向性弱化的例子，例如，当某个人在打电话时漫无目的地在纸上乱画。同样，个人控制的标准也有复杂含义。有很多非意向性的行为，如生理反射，是我们从技术层面上能控制的；例如，我们可以让自己处于较高温度条件下故意出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生理反射就都是行动(虽然那些我们借以获得反应的工具性活动确实是)。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任何阶段的行动都包含个人控制之外的成分过程；如果没有那些我们控制之外的中介机制的帮助，我们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和发展。正如已经提到的，我们甚至无法完全掌握我们行动的内部背景；因而，我们无法自由地计划、希望或相信那些我们想要计划、希望或相信的任何东西(如, Kunda, 1990; Lanz, 1987)。

限于本章的篇幅，我无法详细阐述围绕行动概念的错综复杂状况(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 Greve, 1994; Moya, 1990)。就当前目的，之前的思考可以简化为一个工作定义：行动也许可以定义为这样的行为，(a) 可以根据意向性状态(目标、价值观、信念、意志)进行预测和解释；(b) 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处于个人控制之下，而且是从多种备选行为之中选出来的；(c) 由社会规则和习俗或主体对这些背景性制约条件的表征所支持和限制；(d) 旨在根据个人对所期望未来状态的表征改变情境。

这个定义再次强调了行动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与个人发展意向性相关的自我参照行动还具有其他属性，对此将在后面章节中进行描述。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将尝试对个人和社会因素是如何在行动调节过程中互相交织的问题给出更详尽的解释。

行动的制约条件：构成性和调节性规则

人类行动与规则在两层含义上相关。在第一层常见含义上,行动和个人行动空间受到规则的制约;在第二层更为基本的含义上,行动——或者至少有一些行动——是由规则构成的。根据 Searle(1969)的观点,个体能够区分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和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这些区分可追溯到 Kant;同见: Brandtstädter, 1984b; D'Andrade, 1984; M. J. Smith, 1982; Toulmin, 1974)。

调节性规则

个人行动受到多种文化规定和限制的调节,而且或多或少是正式和外显的(法律、规范、习俗、社会期望等)。这些规则划定了情境限定区域和行动边界。然而,这些由调节性规则所施加的限制并不是强制性的;与自然法规不同,文化法规有时是可以违背的。但是,调节性规则具有“规范效力”(normative force)(Toulmin, 1969);这些规则与辅助性社会效力相联系,比如赞许或者有利于增加符合规则行为的频率和概率的强化模式。调节性规则,无论它们是外部施加的还是内化并整合到自我调节过程中的,都在行动和发展的模式内生成规律。例如,发展任务或者决定社会背景中个体生命事件适宜进度表的标准时间表(如, Chudacoff, 1989; Neugarten & Hagestad, 1976),界定了规范和同步个体生活过程因而赋予发展规程和规律的调节规则体系。

构成性规则

当提到某些举动或者行动时,如结婚、陈述理由、承诺或者罚点球,很明显的是,这些行动不只是简单地受规则调节,在更强的意义上,而是由规则所构成。正如一个人只能在象棋规则的框架内去下棋一样,其结婚、许诺等也是如此。只有根据特定的语义规则和社会惯例才能界定,至少在大纲上,某个行为必须以哪种方式或在哪种背景条件下执行才能作为该特定举动的一个有效例证。将一个行动描述或理解为某一类举动的例证时,是以与相关构成性规则的相近性为前提的(Winch, 1958)。组成特定举动的规则是在脚本式认知结构(scriptlike cognition structure)或者图式中单独呈现的(Schank & Abelson, 1977)。这些脚本和图式使我们能够根据社会共有含义来组织我们的活动,并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推断、预测和协调行动的进程。

通过构成性规则,特定类型的行动与文化制度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 D'Andrade(1984)所指出的,规范性背景的变化改变了可能行动的范围,最终创造出全新类型的行动:

构成性规则体系的结果之一是,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行为整体技能的极大扩展。例如,如果没有称为足球的构成性规则系统,得分、防守、过人等行为就不会存在。(p. 94)

调节性和构成性规则从行动理论角度为重构发展规律性和不变性提供了重要有利点。尤其是构成性规则概念为传统的发展普遍性主题提供了一个全新角度;正如我在后面部分